

87
K261
11
5

盛 成

海外工读十年纪实



湖南人民出版社

B

321957



作者近照

作者留学法国时留影



本书原在中华书局一九三二年出版时的封面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凡例

一、《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选刊1911年——1949年期间各界人士对外国直接观察的记述。丛书冠以“现代”一词，并不是以1911年作为划分近代和现代、以1949年作为划分现代和当代的时间界限，只是因为已经有了一部专收1840年——1911年期间出国载记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思想已经渐渐为许多中国人（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有条件对外国进行直接观察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了。

二、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时的认识变化过程，那末，这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世界在不断地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个过程到现在并没有完结，当然也不会完结。本丛书所能做的，是揭示若干个侧面和断面（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侧面或一个断面），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对于这个过程做一点微观的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

三、基于这个目的，本丛书采辑将不限范围，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考察，文化学术之交流，实业技术之研究，风土人情之采访，亦不拘体裁，无论是旧版图书、报章杂志，以及书简日记、手稿遗文，只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外国和中国，有益于历史文化的积累，皆可入选。

四、辑印旧作，凡作者健在者，均请作者加以校订，新写序言。凡作者已逝世或不在国内者，即按原文排印，只校正原来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差错，文章和内容一般不加改削。有必要时，当然也可以附加一点评介文章，指出今天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尊重作者，更重要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有的书和作者如有违碍，宁可暂时割舍，也不妄作改动，俾免有损原貌，贻误后人。因为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文字，有些事过境迁，当然与当今之报道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此，谅亦为广大读者所能理解者也。

我谨将这朵《海外
工读十年纪实》的
鲜花，献在我
慈母之灵前；
呜呼尚飨！

目次

再版序言.....(1)

第一章 浪滔滔.....(19)

第二章 烟中雾中之英伦.....(29)

第三章 巴黎.....(43)

第四章 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48)

第五章 海外之木兰海涯思丹.....(70)

第六章 意大利.....(75)

第七章 潘特拉克与费修题.....(89)

第八章 我去也——地中海上乱徘徊.....(107)

第九章 白理爱.....(117)

第十章 再上巴黎.....(127)

第十一章 我进巴黎大学.....(146)

第十二章 瓦乃理.....(154)

第十三章 《我的母亲》.....(160)

第十四章 滴娜.....(185)

第十五章 近东漫游.....(200)

第十六章 十年中今昔之感想.....(228)

再版序言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云：东方的事，是偶然发生的。由一个偶然引起另一个偶然，加以社会的宣传与内部的组织，而完成革命的事业。

我一生参加过许多运动，例如：五四运动与勤工俭学运动，都是偶然的机遇。

一九一八年夏，我坐津浦车北上，车上遇见一位句容人，名葛定荣。后来他考进北京大学，我到长辛店，在京汉铁路车上做路工。五四前夕，我去马神庙看老葛，他说：五七国耻纪念，正在酝酿游行，反对巴黎签字。不曾提及五四有什么活动。我走时，他说：明天礼拜，你不忙就来。我就早上去了。下午三时左右，北大学生向天安门出发，那里上午已有各校学生陆续来过。到天安门时，有人提议去东交民巷！到东交民巷时，因不准队伍通过，老葛叫道：去赵家楼！由东边门进入曹宅，在北厢房中碰见穿和服驻日公使章宗祥，于是打了他，又放了火，大家散去！后来的学生，却被警方逮捕，遂产生五四运动。

我回长辛店，向大家报告，向工人作社会宣传，开始组织救国十人团。当时大厂立刻来联系。陶善琮告诉我：

路上有枪！他说：民元二月底袁世凯在北京及本省各地制造兵变，以免南下就大总统，曾发下来复枪两百多支，未曾收回。我明白公开组织工会，不是易事。交通部长卖国贼曹汝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最后，必然是我们来用马后炮来将他的军的。因此，铁路救国十人团，在组织，不在宣传。六三请愿之前夕，我见到天津代表郭隆真、周恩来，他们问我路上情形，我先吞吞吐吐，后来我坦白地说：罢工要有金钱后盾。他们要我去一趟天津。六月七日，我去了天津，住在青年会，见到卞月亭、夏琴西、孟震侯、马千里、周恩来、刘清扬、谌志笃、马骏等人，也第一次认识了吴稚晖，他那时在唐山路矿当国文教师，他已在报上发表许多提倡勤工俭学的文章。他一见我便说：你最合于勤工俭学的条件。他是为五四而来天津的，关于五四，一字不提。他并且让我回北京后，即去华法教育会办理出国手续。

果然曹汝霖被我们的卧槽马与马后炮，轰下了台，章宗祥、陆征舆，也不例外。我去了方巾巷，见门口有三块招牌：一是华法教育会，一是俭学会，一是勤工俭学会。进去之后，见到彭济群。我就把吴先生对我所说的话，告诉了他。他说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手艺，二要懂法文，三要六百元路费。他问我有没有六百元。天哪！我哪里有六百个袁大头！于是不欢而散。我将经过，写信给唐山。

五四运动，最后组织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这样，不致使这运动成一盘散沙，而贻五分钟热度之讥。也可说勤

工俭学运动，是五四运动嫡系的延续。

我到上海，是长辛店的代表，还有郭维海、高凤藻。我约高凤藻同去法国。大会开了之后，我就为筹出国旅费发愁。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先生没有来，由黄大伟代表他演说。后来他传出话来说我胡闹。我当时那沉重的心情，与所有由各地来沪的同志相同。那时，只有向吴稚晖写信求援。那时，他曾向华法教育会沈梁为我写过三封信，最后一信为陈延年乔年弟兄写的，信中云：前日曾介盛、高……诸君，皆素所深知之人。此等人若不介往远游，亦坐失有为之才矣（1919年11月23日）。过了一些时日，吴来信说：汪精卫由欧经海参威回沪，令我携信去看他。我去霞飞坊，陈璧君先出来了，我将信交给她。汪出来见我，立即由陈的侄儿领我去华法教育会看高博爱。高答应代我办一切出国手续，可是四百元路费，必须自备。我又冷了半段。

有一天全国各界联合会开会，忽然我见到黄兴（克强）夫人徐宗汉，她也是代表，于是就寒暄了一番。她见我愁眉不展，便问我近况何如。我不愿吐露真情，免招无趣。她一再表示虽然克强不在世了，但对他的同袍，却不曾忘记。我终于把吴稚晖与汪精卫对我勤工俭学的鼓励，都同她说了。她立刻答应我二百元，另再筹二百元。可是我不能把孙中山先生的话和盘托出啦！就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左右，偶然得到了一个消息，二十二日开出的英轮“勒苏斯”号，有了一张去伦敦的票，震旦有一位同学因

故不能启程，问我要不要？我惊喜万分，急问“多少钱”，“二百元以内”。我立即去找徐宗汉，她答应我下午送来。我当天晚上就把票拿到手。可是美中不足，路上同我来的高凤藻，仍无分文，不免为他难过。我于是请假几天，回家拜别老母及祖母，到南京栖霞山拜别宗仰上人、金陵刻经处欧阳竟无先生等。我回上海，已是二十日。我与徐宗汉、冯禹门、施洋、马骏、刘清扬、郭维海、高凤藻等一一握别。二十二日，我与震旦同学周震等十四人，到了通济隆码头上了小轮，代我们操劳得来船票的上海青年会交际部李启藩干事也在，送我们到吴淞口上大轮。后来熊志南（自难）在上海学生杂志用贵州留学团名义发表一篇欧洲日记，上面曾写：同伴盛君高擎着一杆国旗，彼此欢呼几声：万岁！万岁！

开船后，人在大海，第一次见海。当时，船上有组织的，当然是黄齐生先生领导的贵州留学团，以及南开留欧同学会，由常策欧主持。都准备组织一个临时的同舟共济会。震旦人数最多，共十四人，一盘散沙，分好几个小集团。依省籍分，贵州有十二人，王若飞在内。江苏八人，广东三人，湘、皖、奉、闽各二人，川、桂各一人。其余已记不起来。

这一只老太古公司的蓝烟囱船，在勤工俭学史上列为第十批，经英国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到巴黎，人数四十。（共四十一人，但当时只说四十人，王若飞不在名单之内。——盛成补注于本书再版时）实际上，去法国全数，不过二十二人，

就加上后来由英转法者(至多不过十人)，总共也不过三十二人。其中因为俭学生占大多数，才能由青年会弄到船票。真正勤工生，不到四五人，而曾与华法教育会有过联系的，恐怕不过一二人而已。

关于勤工俭学人数，究竟多少，以后再谈。熊君述船上共济会成立时“盛君成起立发言提议组织学术讲演会，并略说了几层办法，辞意虽不什么条畅，但许多学术上的助益，精神上的娱乐，都藉此引出来了”。

以上所云：辞意不什么条畅，这是我当时上船出海后的心情。因为，自五四以来至上船止，我所过的生活，是社会运动演员的生活。差不多日夜在斗争之中，与军阀、侦缉队、卖国贼、卖日货的小商人对抗，终于不血刃而得到胜利。如今，在船上，所见所闻，与过去大不相同，一般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自利自私，意见纷纭，虽美其名曰同舟共济，实则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不能同心同德。过去因为有热忱，现在是一盘散沙的凉血而没有硬骨头的动物。不容易发动一种运动，勤工俭学的话免谈了吧！

可是岸上国内的事，不能抛弃，令我回想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酝酿罢工。学生、工、商都动员了，只有农民不曾起来表示。我回忆长辛店路工们去附近乡下作农民运动，先是只作不买日货的宣传，后来竟激起他们爱国观念，终于教他们识字。我最后作出决定，如果此番能达到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我一定学农，并与法国的农民，打成一片。

……一定要农民起来，人民的绝大多数，我国的罢课罢工与罢市，都在唤起农民大众。否则，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工运必大流血。商人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尤其是山西的票号，统制华北与东北，不断与外国财团勾结，至江浙的银号与钱庄，不过是上海外商的买办与经理而已。他们已腐化了国民党，成为民族资本家，其实是官商合办。这些人，有乳就是娘，毫无国家意识。都是未来跨国超级大公司的能手。

冬至上午，因昨日听英教士向约翰作盼望的讲话，引起我“觉悟是非后之快乐”。熊君云：“对于觉悟二字，从自身引出，极有发挥。”随后贵州刘方岳君讲“哲学与宗教之观感”，发挥哲学对于宗教之相因点，也是对那传教士所作之迷信的“盼望”坚强的答辩！

一九二〇年一月，我们到了欧洲，由英国前往法国巴黎。十二日早晨，胡平成、苏汝淦与我三人，前往留法勤工俭学会报到。我们先到星场雨果广场附近布岩街八号，门口挂有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的三块招牌，与北京一样。进去之后，无人办公，叫我到乡下去，近郊拉加雷纳·哥伦布·德拉普恩特三十九号。我们问了方向与路线，就一直到了哥伦布，再走回到那条路，找到了。门口挂着“华侨协社”的招牌，楼门上有“华法教育会办事处”字样。我们叩门而入，见到刘厚先生，墙上贴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石曾由马赛回国时的来信。我先问：“勤工俭学会在那里？”他反问我有什么事。“我们都是国内刚

来的勤工俭学生。我们到会报到。”“勤工俭学由我负责，你们每人先要缴费六百佛郎。”“我们都是身上没有法国钱的。”我取出吴稚晖的信给他看，又询问张继的住处。我们下了楼，走进大布棚，看见许多候工的同学。我们一见面，牢骚满腹。我就再问，勤工俭学会的办事人呢？他们说：就是他们包办，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女子俭学会、居家俭学会，这个会，那个会，只有章程，也有会员，也挂有招牌，就是没有组织。

这也就是老谋深算的李石曾先生的锦囊妙计！他一切目的，在争取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他利用这些招牌，来做他的武器，结果，钱到了手，勤工俭学生被牺牲了，由军警押解回国。他在国内除了帮蒋介石出卖故宫国宝，还办了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农工银行、世界书局、世界社、日内瓦图书馆、乌拉圭博物馆，另外不知挂了多少招牌来开支这笔化公为私的国家赔款！而其它的，如中美、中英……都非常有成就，造成许多人才。我们这班勤工俭学生，是反作用的结果，言之痛心！他而今盖棺论定，这位慈禧太后的乾儿子，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他反而影响到蔡元培先生，从他口中发出既无勤工之志，又无俭学之能，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的电报，使蔡先生蒙不白之冤。因为蔡是会长，李是书记。但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真相大白之后，蔡先生千古不朽！

周恩来到法国，是同蔡先生一船来的，我于一九二〇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里昂车站对面的旅馆见到他们。同来的有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他将郭、张托付于我，带回蒙白里去。他们是一月二日去巴黎的。

那时，我与周恩来书信往来很频繁。他在上海走时坐的是“博尔多斯”号，十一月七日开行。他路上换了船，“高尔地埃”号，十一月二十四号由上海开行。他曾有信给我，说与蔡先生、郭隆真、张若名、陶尚钊同船，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马赛，即去里昂，并让我到里昂来接郭、张到蒙白里，她俩住在南部，到五月始离去。那时，恩来用翔宇名字，常有信来。

一九二〇年，是欧洲最重要的一年。我到法后不久，即与铁路工人有了联络；后来在旺多姆中学时，由印刷工人的介绍，加入法国社会党 S.F.I.O 及铁路工会。我被选做出席斯特拉斯堡大会的代表。那时，欧战刚停不久，一切尚未复原。外国人在法国，不但不受歧视，而且极受欢迎。我那时是中国铁路工人，又是勤工俭学生，所以认识许多法国社会名流以及社会党与工团的领导人物。那时欧洲各国的共产党组织正在酝酿中。例如德国的蔡特金，虽说德国的党已经于一九一八年成立，她仍奔走于柏林、巴黎与莫斯科之间。又如荷兰党领袖罗兰浩斯特，一位女诗人，在热心组织西欧各国党部。她们都出席了斯特拉斯堡大会，好使法国党部早日诞生。结果，因各方意见分歧，大会延会，至年底在都尔再开。法国社会党，这是我们外国人称的，它自称 S.F.I.O，这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首字缩

略词。它于一九〇五年由好几个政法社会组织产生的。在这里，以法国工人党为主，是马克思派，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可是还有进步派的社会党，主张用选举方式。还有工团主义的，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大致说来，有人主张用严格组织与严格纪律的，有人极端反对组织与纪律的，有人主张要有组织不要纪律的。我在当时，极端主张有纪律有组织。我常说：有总比没有好，有则成功，没有则失败。当时我对华法教育会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也是如此。法国社会党自大战以来，参加政府神圣同盟，遭遇到第二国际的惨败，国家主义与机会主义受到批评，产生工人罢工与士兵起义。尤其是俄国大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掌握莫斯科政权。列宁又组成第三国际。战败的德国，前年已组成分部，现已参加。法国的社会党，受了致命的冲击，在党派内部失去平衡，发生空前深刻的危机。其中有一派，即社会党员多数派（Fraction—Socialiste Majoritaire）倾向马列主义与第三国际的，他们在二月底召开斯特拉斯堡大会上竭力主张：放弃第二国际，加入第三国际。结果是无结果，派加香、弗罗萨尔再去莫斯科商讨一切：内容是组织与纪律问题。

我在巴黎，曾参加达达文艺晚会，那是轰动一时耸人听闻的丢脸大事！然而这些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在那时候，不过画一些后来的摩天大楼的模型、机器人的内部草图等等（一九七七年八月在柏林展览二十余件，我曾应邀参加）。

布里昂说：没有比这些模型更能引起人的兴趣、讨人喜爱的了。天才的启示，贡献出自己唯一的研究。以何等的高度，令人明悉如何达到完善的高峰。我用他的话来鼓励动荡中产生之微笑。我在当时，亲身体验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坛上两大主流：一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一是雅里的于布王。前者引起意识问题，尤其无意识即无明，不自觉有意识不到的，下意识即潜明，相信偶然的作用。并说：在打开一部字典里，曾发现达达这一名词。这也是无意识的表演。布雷东在二十年那一年，与沙拉相逢，他深受心理分析的影响，研究梦，作潜意识的探讨，求出一种不受一切因果逻辑牢笼着的超现实之事物。

在每天的晚会上，充满了反科学、反道德、反宗教、不合理、无逻辑的笑话、荒唐话，一切虚无主义的批评，语无伦次的蠢话，来达到破天荒的耸人听闻，暴露丑社会的恶人坏事。我们有些人，觉得这样自由，绝对的自由，将使已埋葬地下的浪漫主义再度死灰复燃，涌露突破，卷土重来！变得更为厉害！所以，我们已有参加派（engagé）的观念在酝酿了：“超现实派为革命服务”出版了！布雷东一九二七年入党，阿拉贡一九三一年，艾吕雅一九四二年，毕加索一九四四年。我咧，下面再说吧！

这一年，一九二〇年，是西欧文艺最动荡的一年，每天都有新人、新物、新思想，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最后，百川汇流，形成“巴黎文艺大合流”，而以毕加索为代表。